第一章　名人传奇

孙中山与镇江

李守静

孙中山与赵声

赵声，字伯先，著名的镇江藉辛亥志士。他于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 1903 年 2 月东渡日本，同邑青年柳诒徵与其同行。赵声在船上对柳诒徵说道“生平最佩服孙文。”两人谈及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均十分赞成。这是赵声后来亲近孙中山并与之结成深厚的战斗友谊的思想基础。

1906 年春，同盟会员吴旸谷奉时在日本的孙中山之命，回国发展同盟会员。他来到南京，经一番考察，逐介绍时任南洋新军第 9 镇 33 标标统赵声、柏文尉、林述庆、伍崇仁以及镇江籍的军官冷遹，李竟成、陶骏保等人加入同盟会。他们组织革命机关于鼓楼之某宅，将玄武湖后湖神庙作为秘密活动地点。革命党人在鸡鸣寺举行秘密会议，公推赵声为长江同盟会盟主，并呈报孙中山，孙中山当即批准，并令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人将印信及委任状送至南京赵声手中。赵声派卢镜寰为自己的联络员，与孙中山经常联系。从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赵声在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总部的直接领导下，在新军中大力开展规模化的革命活动，掌握与运动新军，为日后图谋大计打下基础。

1910 年 5 月 13 日，黄兴经与赵声商谈后，致函孙中山，函云：他俩认为去年广州新军起义虽然失败，但仍可在广州再次起义。黄兴在函中写道：“赵伯先兄于军事甚踊跃担任，特别军界多属望于他。此次款项若成，可委广东发难之军事于伊。命弟为参谋”。孙中山阅函后，对两人的计划极为赞同。同年 6 月，孙中山从美洲赶往日本，密电邀赵声和黄兴赴日面商起义大计。

1910 年 6 月 11 日，赵声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第一次会晤，两人心仪已久，如今见面倍感亲切，十分兴奋激动，热烈拥抱。孙中山对他十分器重，在军事上倚重于他。会上，赵声向孙中山献策道：“欲即再举，必当遣人携数千元回国接济同志，免彼散去。然后图集合而再设机关，以谋进行。”孙中山对此十分重视，并视为首要之计，立即采纳实行。这次会议，孙中山和赵声等人“多次密商革命进行方略，谋设秘密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行动。”

1910年秋，赵声赴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于 11 月 13 日出席了由孙中山秘密主持召开的中国同盟会骨干会议。这是赵声与孙中山第二次会晤，未想到小别五个月后又重逢，共商大计，两人均感十分高兴。会议决定集中同盟会的全部力量，与清政府在广州进行一场‘破釜沉舟’的大决战，孙中山和赵声等人共同具体制定出广州起义的计划。会议

决定：赵声、黄兴具体领导和部署起义的军事行动。这里再次显示出孙中山对赵声的巨大信任和军事上的倚重。赵声在返港途中,写信给孙中山说道“:先生到欧,似仍以速进为是。”“弟以身许国，断不能偷无味之生。此别不知能否再见？”信中的语言充分表达了赵声对孙中山的巨大期望和自己慷慨赴义，视死如归的精神。

赵声第一个抵达香港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1911 年 1 月,在香港跑马地 35 号成立了统筹部，众举黄兴为统筹部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兼任交通课长。赵声设立机关后，积极联络新军、巡防营、会党,组织‘选锋”。4 月 8 日,统筹部开会，任命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司令，即起义的正副总指挥。1911 年 4 月 27 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爆发了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之役”。虽然遭到失败,但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孙中山对赵声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赵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这次重要的武装起义总指挥而流芳百世，永垂青史。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赵声悲愤成疾,临终前,连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1911 年 5 月 18 日中午一时，他病逝于香港雅丽氏医院，终年虚 31 岁。黄兴和胡汉民写信向孙中山报告赵声逝世消息，孙中山长叹不已，为志士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

1912 年初，以孙中山大总统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明令追赠赵声为上将军，以表彰其历史功绩；并委派赵声三弟赵翊三赴港将赵声遗体护迎回镇江竹林寺畔，立碑安葬。

1979 年 8 月，孙中山夫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亲书“伯先公园”四个大字。1980 年 10 月，孙中山随从秘书、80 岁的田桓老先生书写了全文为 145 字的《赵伯先简介》。如今，题字和简介均镌刻在伯先公园大门口，供海内外各界人士观赏浏览。

孙中山与金山寺宗仰法师

宗仰和尚于 1881 年(清光绪七年)来到金山寺,受戒于方丈大定法师，赐法名为宗仰。由于他多才多艺，办事精干，不久升为监院。1892 年，受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妇之邀赴沪爱俪园（即哈同花园）主持家庙讲授佛经。宗仰虽为出家人，却时刻关心国事，常怀献身济世之志。受新思潮的影响，他倾向反清革命，先后加入兴中会和同盟会。他时常撰文在《苏报》上发表,鼓吹革命,引起清政府的忌恨,逐被通缉而避走日本。

当时适逢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宗仰在横滨谒见了中山先生,两人倾心交谈,志同道合,相见恨晚,结为知己,宗仰稍长于中山先生，两人逐以弟兄相称，同住一幢楼的上下间。

江苏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出版进步刊物《江苏》，因经费不足，一度中止，宗仰出资助其复刊。他和孙中山一起在《江苏》上发表了许多诗文，这对于当时国内外知识界朝着

革命方向的思想演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宗仰在孙中山的直接教育影响下，在日本各地演说，大力进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宣传。

1903年9月下旬，孙中山离日赴檀香山从事革命活动前夕，宗仰慷慨资助孙中山旅费两百元。并作《饯中山》送别诗相赠:“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邗水奠新都。”诗中记叙了他与孙中山在日本的秘密交往，抒发了他的壮别寄愿和革命大志。1908年宗仰由日返沪后，接到孙中山从美国寄来的函件，孙中山在信中将自己与康梁保皇党作斗争的情况以及初步胜利的捷报喜告宗仰，并希望宗仰及在沪同志遥作声援。可见孙中山对宗仰的倚重和期望甚切的心情及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返回上海,宗仰首先得讯，特雇一小汽艇出吴淞口外迎接归来，并热情邀请孙中山去爱俪园。12月30日晚，在研究中华民国国旗一事时，孙中山与章太炎发生激烈争论，双方相持不下，经后宗仰一再调停，最后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决定用五色旗作为一种过渡。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沪赴宁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经过镇江时，宗仰法师先派人到金山寺传达信息，并希方丈届时率僧人们去欢迎孙中山。于是，当日在镇江西门火车站欢迎孙中山大总统的人群中有着数十位身披袈裟、胸挂佛珠的金山寺和尚。

民国建立后，宗仰和尚淡泊名利，功成身退，归隐金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寺。但他时常怀念好友孙中山先生，很想他来此游赏小憩，老友重聚。1916 年他在金山寺内写成一函寄给孙中山先生，函云“：中山先生伟鉴，别来瞬经三稔——金山也系京口名兰，仆谊属故人，曷勿杖策第一游，不惟可助逸兴，且得旧雨重欢，借倾积愫，想公游兴未阑，望能慨允惠然莅临，扫径以待，即请赐复！并颂钧安。不慧宗仰合十。”遗憾的是孙中山为国事操劳繁忙，无暇光临金山寺。

后来，宗仰法师在复兴六朝古刹——南京栖霞寺时，缺乏资金，孙中山知晓后，首先捐赠银币万元，助其修建，同时也作为归还宗仰和尚义助革命之款。从中可见孙中山先生不仅重友情讲义气，而且还注重和支持江南古寺名刹的复建工作。

孙中山与镇江革命军普通战士

镇江革命军是江浙联军中一支实力雄厚、战斗力极强的主力部队。在与清军的激战中，镇军官兵们英勇善战，士气高昂，不怕牺牲，在镇军都督林述庆的指挥下，首先攻占地势极为险峻的南京紫金山天堡城。随后，林述庆率领镇军于 1911 年 12 月 2 日中午十二时从太平门最先攻入南京城。林述庆骑在高头大马上，春风满面，吟诗道“：降幡高拂石头城，日照雄关万角声。如此江山收一战，居然还我汉家营。”诗中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镇军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都南京城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永载青史，彪炳千秋！

镇军第一标第一营前队二排二棚副目（即副班长）石凤

鸣，作战英勇。在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负伤，腿部严重伤残便留在了南京城。当时，镇军奉命继续北伐，挺进和转战于浦口一带，与张勋的辫子军展开鏖战，进一步消灭清军。石凤鸣想接换一条假肢，以便今后行走和谋生。这时，镇军正在前方打仗，自己身上又没有钱，他心中十分焦急。这时，他想起了同在南京城的孙中山大总统。于是，他壮起胆，十分艰难地行走至大总统府去找孙中山。门卫了解他的情况后十分同情他，经请示孙大总统后便让他进去。孙中山在日理万机中接待了石凤鸣，认真仔细地听取了他的申述，非常重视这件事。孙中山于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令”的形式，下达给陆军总长黄兴上将为首的中华民国陆军部，要陆军部遵命执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令”中说道：

“兹据镇军第一标一营前队二排二棚副目石凤鸣禀称：因中弹负伤，请给费接换假腿等情前来。查镇军既已出发，该副目因伤独留，情实可矜！惟该副目伤状如何？曾否由镇军赏恤？抑应照给医费之处，仰贵部查明，酌核办理，以慰士心,原禀并发,此令,孙文。”

这已是九十年前的一件感人之事，当我们在九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拜读这份当年的大总统令时，仍然激动不已。大总统令的字里行间，显露出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博爱之心和仁爱之心，关怀、爱护、体贴处于困境中的镇江革命军一位普通战士的深挚情意！同时，我们也可看到孙中山对镇军的高度重视。

孙中山与镇江地方的关系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从沪赴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途中经过镇江，在当时的镇江西门火车站停留的时间远比苏锡常为长，还发表了近十分钟的简短讲话。在镇江西门火车站内，孙中山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他心情特别兴奋,面对人潮,声如洪钟般地说道“:此次光复,均赖诸君之力,本总统敬为四万万同胞致谢!”听者无不振奋，无不为之动容。有一位人士问道“:内阁何时可成?”孙中山答曰:“日内即可发表！”这时，又有一位人士问道：“何时宣告万国?”孙中山先生豪迈地说道“:万国已承认,宣告亦数日间事耳!”

孙中山在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几小时前，即以大总统的身份最先告诉镇江各界人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阁于当日诞生；并对支持和拥戴他的四万万同胞和镇江人民表示了热忱的谢意。他的这一番话语有力的鼓舞了为实现共和、推翻清廷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的镇军官兵和镇江民众。当晚,人们欢呼雀跃,喜形于色,奔走相告,欢庆民国政府成立的浪潮首先席卷镇江城乡的大街小巷和每个角落,不亚于 90 年后的今天，镇江人民欢呼申奥成功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孙中山先生第二次到镇江的时间，据笔者多方考证，为1919年，是从上海到镇江的。

孙中山先生的宏著巨篇《建国方略》，分为两大部分。据天津出版社于 1979 年第一版《孙中山年谱》中载明,孙中

山于 1918 年 12 月 30 日写成《孙文学说》第一部分，也即《建国方略》第一部分,于 1919 年 6 月出版。接着，孙中山于 1919 年又写成第二部分《物质建设》也即《实业计划》。《实业计划》这部分中有《整治扬子江》和《建设内河商埠》两篇。在《整治扬子江》篇中,孙中山写道“:开凿北岸瓜洲入江新水道，就江面裁弯取直，从而大扩展镇江城外陆地以建立新的沿江工商业市场,恢复和进一步繁荣镇江港。”在《建设内河商埠》篇中,孙中山专写一节,提出对“‘ 镇江及其北岸 ”的整治，兴修和全面建设新镇江港的宏伟规划。所以，笔者考证为：孙中山第二次到镇江是为了写书而来，是有目的、有计划而来。孙中山 1919 年乘专车来镇，在西门火车站，孙中山受到镇江老同盟会员和各界人士数十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这次到镇江亲自认真详细地察看、巡视了镇江港（亦即今长江路）一带的地形、水道实况。孙中山还应邀分别在镇江商会和镇江商团进行了演讲，在镇江商会演说内容是国民革命要旨。会场是座无虚席，听众情绪极为热烈，镇江民众饶有兴味地聆听了中山先生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孙中山乘车来往于市区主干大道时，伫立于两旁行人道上的镇江人民一致鼓掌，向他欢呼，向他致敬。当晚，孙中山下榻于伯先路上的广肇公所，第二天一早，孙中山乘专车赴南京。有趣的是，孙中山先生这两次行车线路都是沪一镇一宁。

一个世纪同龄人的革命旅程

—— 共产党人嵇直的故事

嵇均生

嵇直(1901 年 －1983 年),镇江人,故居在京畿路街道布业公所 8 号。他从 20 年代起投身革命,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镇江第一个共产主义事业播火人。作者嵇钧生系嵇直亲属,现为国家航空航天部研究员。

楔子—— 周恩来亲笔回复了一封莫斯科来信

1941 年夏,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接到苏联使馆的一个电话,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参赞求见周恩来同志。这位参赞刚从莫斯科来,应一位中国同志的郑重托请,要向周恩来同志面交一封信件。当对外组的同志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后,周恩来说,看来这并不是通过组织系统递交的正式文件,那么有没有说这是什么信?为什么这么慎重其事一定要面交呢?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周恩来嘱咐办事处的同志与苏联同志约定,安排在最近一次中苏文化协会的活动时见面。

几天后,那位苏联同志将一封写着“面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的信交给了他。写信的人叫嵇直,周恩来过去也似乎听过这个名字,但他们没有直接交往,他并不知道嵇直的具体情况。于是他把信带回周公馆,细看后知道,原来嵇直在 20 年代已被派往苏联工作。他在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和几次被党中央派到苏联学习和工作的

情况，特别着重谈了他为培训党的基层干部，于 1926 年被党中央派往苏联远东地区党校教书的过程。他在信中说，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曾对他说，将在两年后派人轮换，然而以后没有人去接替，而他根据中共中央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规定于 1928 年转为苏共党员，就这样他在苏联长期呆了下来。现在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请党中央调他回国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同时他告诉周恩来同志，最近，在苏联的清党和肃反运动中，由于他受到某些人的诬告，不承认他是由中共中央派到苏联工作的，他因此被开除了苏共党籍，并一度被解除了公职，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早澄清，早晚还会遇到大的麻烦，可是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大多已牺牲了，即使个别可能活着的同志，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更没有办法和他们联系。嵇直说，他知道周恩来同志处在重庆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日理万机，内政外交工作十分繁忙，很不应该打扰他，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给他写信，请中央给予直接证明。

周恩来同志看完信后，心里很不平静。嵇直提到他当时参加的许多工作有些已成了重要的历史事件，他提到的那些共事过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同志都是建党早期重要的领导干部，如今大多数已经牺牲了。在当年白色恐怖的年代，如果嵇直不是直接参与者和当事人，是决不可能知道这些的，自己虽然对嵇直被派往苏联的具体情况不直接知道，但是眼下身边最清楚这些建党早期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同志的，恐怕也只有他自己了。对于这样一位幸存者，一位流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外多年的革命战友的请求，他怎么可以不过问呢？

于是，他拿起了笔写道，他十分理解嵇直要求早日回国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迫切心情，不过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还不可能调他回国。但是在苏联工作，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为了抗击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也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希望他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苏联也要努力工作。他答应，以后一当条件允许，一定会调他回国。

接着周恩来考虑了嵇直所要求的证明。历史一页一页地从眼前翻过，他仿佛又看到了曾经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多少年了，他始终忘不了这些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同志，时时记起他们。眼下要写的证明，使早期的党史在自己脑中连贯和复活起来，其中张秋人（1898－1928 年）、罗亦农（1902－1928 年）、宣中华（1898－1927 年）、赵世炎（1901－1927 年）、孙良惠（1898－1930 年）都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沈泽民（1902－1933 年）因积劳成疾而病故；贺昌（1906－1935 年）在战斗中牺牲；邢项英（1898－1941 年）刚刚牺牲在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之中，眼下只有石琼一人还健在。

周恩来在确认嵇直提供的种种历史事实后，停笔思考了一下，虽然他在这些证明中，用了许多诸如“合乎事实”“完全可能”等许多肯定的语气，并且特别称自己作的是“负责证明”。但他仍不放心，他深知当时苏联肃反中的情况，又设身处地为嵇直作想，要尽可能为嵇直找到直接证明。于是他想

到了陈赓。1926 年陈赓和顾顺章、陆留三人,几乎和嵇直前后脚被派到苏联远东，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但是顾顺章以后成为可耻的叛徒。陆留则已退党。只有陈赓是八路军的旅长,现在正驰骋疆场,与日寇作战,这是唯一可能作直接证明的人了。于是他又写了一段，他问稽直是否知道陈赓,如果知道,他还可以电询陈赓取得直接的证明,这样他一边思考，一边写了下来：

关于嵇直同志所要求的证明，当我在中央工作时，他已不在中国了，故我对他不直接知道。不过，他所叙述的事，一般的都合乎事实。如张秋人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那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张秋人同志在 1922 年确是在青年团工作。而且那时青年团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1923年在广东开全国代表大会，才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如工人党员孙良惠为嵇直同志所介绍，当时确有此人，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1924 年夏,项英(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同志确曾领导过小沙渡工作。1925 年,张秋人和宣中华两同志在上海是可能的。贺昌同志当时确在上海工作。沈泽民同志确是 1926 年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学的。从1925～1926 年起,罗亦农同志任江浙区党委书记,赵世炎同志任党委组织部长，他们两人过问嵇直同志的事，是完全可能的。1926 年 9 月,石琼同志确任中央交通,嵇直同志赴海参崴，由他通知并代办动身手续，完全合理。那时，梁柏台同志确在海参崴工作，由中央介绍嵇直同志给梁柏台同志

也极可能。

根据上述各事，我只能证明在可能，因为我当时还没到中央(时在上海)工作,尤其不幸的是,上述这些同志,除了石琼同志以外，全都牺牲了。故我无法为嵇直同志找到这些同志的直接证明。不过，我所能作负责证明的，即是，在当时(1926年)派人去海参崴工作,如非党员或非青年团员，是不可能被派去的，除非这个人是华侨而非由党派去的。

我还记得,在1926年冬,党中央还派了陈赓同志(现任八路军旅长）及顾顺章（已成叛徒）等三人（还有一人已退党)去海参崴学习,不知嵇直同志知否此事。如知道，我还可电询陈赓找到证明。

周恩来(签名),Chow En－Lai 签名）

一九四一.一〇.九。于重庆

在这封666个字符的证明信中，周恩来24次提到了13个人的名字，提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提到了上海党的活动，提到了远东的党组织，甚至还为嵇直提供直接证明人的线索，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时，他慎重地签署了周恩来三个字。考虑到这是在为身处异国的同志所写的证明，便又用英文签上了 Chow En－Lai。这种罕见的做法，充分表现了他对这封信的重视。

几个月后，这封珍贵的证明信仍被那位热情的苏联同志送到了正在莫斯科郊外战壕中的嵇直手中，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嵇直热泪盈眶地读了信，周恩来热爱同志，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此后，嵇直一直把信珍藏在

身边，成了鼓舞他为革命事业斗争，不怕困难，永远向前的精神动力。回国时，他将信带了回来，如今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早已作古，然而这封信将会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世世代代被人们牢记。

从这封信，引出了一位与世纪同龄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真理，追求人民解放事业，所经历的革命历程，他是同时代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普通实例，这些已然遥远的历史对后人仍是深有教益的，他一生出生入死，历经坎坷，在漫长的 6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在不同时期和他一道斗争的战友,有的在 20 年代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有的在 30 年代被盛世才直接间接地杀害，有的在 40 年代死在苏联的劳动营中，也有的在对德、日法西斯的斗争中亡命异国他乡，更有在‘ 文革 ’中死在了‘ 四人帮 ’手里的。而嵇直经历过所有这些不同年代出生入死的斗争后，竟然能在百般磨难中活了下来，这也是他坎坷一生的幸运之处吧！

1998 年 3 月，笔者参加在重庆市召开的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00 周年“ 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讨会 ”时，有幸见到了童小鹏同志，当年童老在重庆时就在周恩来同志的身边工作，当笔者给他看了周恩来同志信件的复印件时，他告诉笔者，当年周恩来同志是南方局的负责人，也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负责人，要确定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一般对内的具体事务由许多同志分工负责协作，而与对外联络有关的事务都由王炳南等同志处理，但是对于那些比较重要又不便让工作人员做的事，他总要亲自处理。像这样的证明信

件，显然是别人难以代替的，于是他就亲自处理了。但是这么系统地为一位在国外工作的同志写了这么详细的证明信，这还是很少有的事，说明了周恩来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他还说,像嵇直这样,一生为革命奋斗,在海内外历经坎坷，为中国和苏联都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应该宣扬。

我们不妨来讲讲这位革命者的故事，在这里既没有惊天动地的战争描述，也没有运筹帷幄的策略谋划，然而正是这样一些默默无闻，为革命献身的普通斗士，组成了通向革命胜利历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叙述了我们不应忘却的故事。

“四九子”和他的成长之路

在长江三角洲金三角和镇宁扬银三角的共同顶端，长江和运河交汇的地方，有一座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古城镇江。光绪二十六年，即农历庚子年的除夕之夜，在城外布业公所巷的一座二层楼房里，诞生了一个小生命，久候在客堂里的男主人看到是个男孩，欣喜万分，赶快燃起了花炮。正在这里，四面八方也响起了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似乎全城都在迎接这个小市民的诞生。他就是后来成为镇江第一个共产主义事业播火人的嵇直。因为是男主人嵇惟高四十九岁得到的儿子,小名就取做‘四九子”。

嵇惟高出生在扬州东乡严家桥束家庄（今属刊江杭集），是祖上从外地逃荒流落到这里的。多少年多少代人都是靠给人打长短工维持生活。他的祖母、父亲、母亲和三个兄弟在他七岁以前就先后贫病而死，只留下了他和十来岁的哥哥。两个孤儿只好自谋生路，哥哥去跟人家学打铁，小

惟高去给一家农户割草放牛。一次不小心，锋利的镰刀把他的小手指割掉了一节，留下了终身的残记。

小惟高在饥饿和屈辱中成长。苏北土地贫瘠，许多人都跑到上海和江南去了。一次村子里有位在镇江做瓦木匠的乡亲回来探亲，惟高便要求他带自己去镇江学手艺。好心的乡邻看到惟高勤劳忠厚，无父无母，很是同情，便答应稍大些可去镇江找他。

1867 年，16 岁的小惟高挑了一副担子开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担子的一头是一个草垫和一捆可作为柴草的芝麻秸和几件破衣烂衫，另一头是几个锅碗瓢盆和一点粮食。他到镇江投靠乡邻学手艺了。他先学会了打木器家具，后来又学会造椽上梁，成了一个人人夸奖的好木匠。

木匠满师后，他又拜师学砌砖造房，又成了一个好泥瓦匠。经过几十年奋斗，终于发了家，便开了嵇惟高营造作坊，渐渐地在镇江建筑界树立了很高声誉。但他的生活仍极为俭朴，终生保持了粗茶淡饭的习惯。

嵇惟高发了家，却没有儿子。有人在背后讥讽他，这么省，赚到的钱将来还不知姓什么哩！话传到了他的耳里，好吧，既然这样，没有必要置产业了。于是，他求神拜佛，行善积德，开始热心公益事业，修桥筑路，赈灾济贫，在镇江住宅附近修建浚深了一口公井，在扬州老家独力兴建了一座石桥。现在终于有子，嵇家不但不愁香火断绝，兴许会更兴旺发达了。

然而，嵇惟高却怎么也没有料到，生在社会变革年代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